

· 文学专业 ·



A SERIES OF BOOKS OF SUPERIOR MASTER THESES OF FAMOUS UNIVERSITIES IN CHINA

中国名校优秀硕士论文丛书

北京大学

卷

高远东 李杨 主编



山东友谊出版社

· 文学专业 ·

G643.8
10
:3

A SERIES OF BOOKS OF SUPERIOR MASTER THESES OF FAMOUS UNIVERSITIES IN CHINA

中国名校优秀硕士论文丛书

北京大学 卷

高远东 李杨 主编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名校优秀硕士论文. 北京大学卷/高远东, 李扬主编. —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5.11

ISBN 7-80642-934-4

I. 中... II. ①高...②李... III. 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汇编 IV. G64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2099 号

中国名校优秀硕士论文丛书

北京大学卷

高远东 李 扬 主编

主 管: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755 82098756

发行部 (0531) 82098035 (传真)

出版发行: 山东友谊出版社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70mm×230mm

印 张: 17.5

插 页: 2

字 数: 218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编选说明

光东从上海来电,谈到山东友谊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中国名校优秀硕士论文”,并委托我们选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北大分卷。我们都觉得这个选题不错。国内大学恢复研究生招生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历史,加上近年大规模的扩招,在读的研究生越来越多,每年的考研大军也越来越庞大。出版这样一本优秀论文选,对在读研究生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对历史不长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能做的题目大都已经被人做过,如何形成新的问题意识,是每一个学生及其指导教师每年都得重复面对的难题,这样的优秀论文肯定能为他们提供帮助。与此同时,对于准备考研的同学来说,这种在一般场合不容易看到的论文集显然能够增进他们对相关专业的理解,有利于他们在学科和专业上的选择和发展。

但选编这样一本文集的工作却并不轻松。北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论文数量惊人,加之判断人文学科论文的价值标准素来难以统一,常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要在近年的数百篇论文中挑出数篇“最优秀”的论文显然存在着困难。因此我们不得不尽量缩小范围,主要从我近年参加有关答辩时留下较深印象的论文中进行选择。这样看来,本文集中收录的论文很难说能真正代表“北大水平”,但称其为“优秀论文”大约还是名副其实的。

此外,考虑到留学生一直是北大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特意在文选中编入了两篇留学生的论文。

高远东 李 杨

2004年11月10日于北京大学

总目

周作人与清儒笔记

——葛 飞(1)

“新秧歌”的构造——对30年代~40年代秧歌的考察 ——赵锦丽(49)

1946—1948年平津文坛的“新写作” ——段美乔(103)

郁达夫的文类选择与现代转型 [韩]洪焱炎(151)

追寻主体性的情爱写作

——大陆八十年代小说研究的一个面向 ——蒋 晖(181)

“权力”与“反讽”——刘震云小说艺术论 [韩]金叡敬(245)

题目：周作人与清儒笔记

姓 名： 葛 飞

学 号：

系 别：

专 业：

研究方向：

导 师：

目录

引 言	5
一、从晚明小品到清儒笔记	9
二、“学隐”：出世与入世之间	18
三、文抄与杂文	25
四、史鉴与策、论	31
五、无可言说之言说	38
主要参考文献	43
主要参考论著	46

引言

周作人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写了大量读书随笔式的文章，钱玄同曾戏称之为“文抄”，周作人自己亦以《夜读抄》名其集。对于周作人的此类文章，历来评价多不高。其理由大致有二：一是这些“文抄”无我，满目都是古人文字，自家意见何在？^①二是从狭义的“文学”观念出发，认为“文抄”不如早期的言志散文。然周氏文抄之自家面目，实在意而不在辞。周木斋曾引章实斋之言为“文抄”辩护，称文学性散文与“文抄”之差别，是“文”、“史”之别，也是“作”、“述”之别。^②章实斋在《文史通义·辨似》中，力辨“立言”与“文辞”之不同：“文章之士，极其心之所得，常恐古人先我而有是言”；“立言之士，以意为宗，盖与辞章家流不同科也”。在《说林》一章中，章氏又称，“修辞不忘夫暂假，而贵有载辞之志识”，如“有卓然成家之文集，虽入他人之代言，何伤乎！”^③

周氏文抄常以谈史或品评前人言论的方式批评时弊，因此，评论此类“文抄”，当在考察其“志识”的基础上，再品评其文章之优劣，而不能从抽象的文学性出发，以言志小品之“独抒予怀”为准。周作人抄书，亦可谓以他人之文代己之所欲言。他曾称：“文字本是由我经手，意思则是我所喜欢的，要想而想不到，欲说而说不出的东西，固然并不想霸占，觉得未始不可借用。正如大家引用所佩服的古人成句一样，我便来整章整节地引用罢了。”^④此处所言虽是其译介文章，借用于“文抄”，亦颇觉合适。事实上，周作人的早期“文抄”，就是从其译介文章中化出的。

周作人早就有“停止制造(高谈阔论的话)而实做行贩”的打算，他觉得，“别人的思想，总比我的高明；别人的文章，总比我的美妙；我如弃暗投明，岂不是最胜的胜业么？”^⑤1923年编定的《自己的园地》中，有题为《绿洲》和《茶话》的两组文章，这些文章多由翻译的片段和按语组成，可谓是日后“文抄”的雏形。周作人称，“写自己所不高兴作的文章，翻阅不愿意看的书报，这便不能算是真的读书与工作”^⑥；报章中“总是充满着不愉快的事情，见了不免要起烦恼”；写杂

①林语堂于《记周氏兄弟》一文中称，周作人“专抄古书，越抄越冷，不表意见”。（《鲁迅学刊》，1981年第1期）周作人的回答是：“没有意见怎么抄法？如关于《游山日记》或傅青主（皆在《风雨谈》内），都是褒贬显然，不过我不愿意直说。”（1965年4月21日致鲍耀明信，《知堂书信》第381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钱理群亦认为，周作人“读笔记的笔记”，都“打上了作者‘自我’的鲜明印记”。（《周作人论》第2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周木斋：《今文辨伪》，《人间世》第3期，1934年5月5日。

③章学诚：《文史通义》（叶瑛校注），第340页、349页，中华书局，1994年。

④《〈永日集〉序》，《永日集》第1页，岳麓书社，1988年。

⑤《胜业》，《谈虎集》第47页，岳麓书社，1989年。

⑥《〈绿洲〉小引》，《自己的园地》第77页，岳麓书社，1987年。

⑦《山中杂信》，
《雨天的书》第131页，
岳麓书社，1987年。

⑧《〈绿洲〉小引》，
《自己的园地》第77页。

⑨其手法请参阅
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
过(增订本)》，第317页~
323页，辽宁教育出版
社，2000年。

⑩《十堂序跋选·
〈文史丛著〉序》，《文
史》第1期，1944年11
月。

文就好比抚摩创口，保留“受伤的意识”^⑦，以引起疗救之注意。但是，偶然花一两个小时“闲散地看书，而且所看的书里也偶然有一两种觉得颇惬意目，仿佛在沙漠中见到了绿洲(Oasis)一般，疲倦的生命又恢复了一点活气，引起执笔的兴趣，随意写几句，结果便是这几篇零碎的随笔。”^⑧按周作人的说法，这些“自己的园地”中的绿意，实是自娱之作，但谈论儿童文学、性道德以及法布尔的《昆虫记》，仍有现实意义。只不过杂文是批评现实生活中种种不道德现象，而“文抄”则多择取正面的文字而已。

《夜读抄》中的文章，实是《绿洲》和《茶话》的发展，但周作人已有意地把“文抄”当作一种文体来经营，调配按语和抄录文字的手法更为圆熟^⑨。《夜读抄》大部分篇目和《绿洲》、《茶话》一样，所抄多为外国书；日后因“想知道本国的事情”，周作人的兴趣才逐渐转向了清儒笔记。以本国之“史”谈当下之事，可见时事本“古已有之”，自可说得更为深刻。日后，周作人在为谢刚主《文史丛著》作序时称：

不佞平日喜杂览，对于四部各有部分的兴趣，又曾闻先贤有六经皆史之语，觉得凡所涉猎亦悉是有用的史料，不特有时想用作解嘲之词，亦实欲以自勉，期于下笔矜慎，无失学问之本意耳。……就文献以求其因革之迹，是为历史，史与学其实是一而二，若人文科学则正是史之正名也。我看中国杂书，感觉一种不满，可称之曰史的常识之缺乏，此盖由于史学之太专门化，书既浩瀚难读，学者所致力又多在年代官职之末，遂渐与生活游离，限于自立，遽论及物。^⑩

“六经皆史”，笔记亦然。周作人欲使“史”与当下生活发生联系，以“益人心智”，所以对记录典章制度一类的笔记，不甚感兴趣。

不过，周氏文抄就文体而言，却非章实斋所言之“著述”，而更近于其所抄之笔记。自胡适标举有系统之著述以来，笔记在国人的心目中地位日减。钱穆即批评部分清儒虽“足成一家之言”，然“其自所创通之见解，必一一纳之《语》、《孟》、《周易》”，若“卓然自抒心胸之所得，效实斋《通义》体例为之，则其成绩，必远超于今诸书之为一鳞

一爪,隐现出没于烟云雾霭之间者。”^⑩不过,清儒汉学为纠明人空言心性之弊,而征之以实学,虽有矫枉过正之憾,却不能一概以拘牵视之。周作人虽多有创通之见解,亦每每纳之于古今中外诸家之言,然于举世“自抒心胸之所得”,人人求“日新日日新”之时,“据守”当别有意义,我们亦不能以拘牵视之。况其“文抄”,于三十年代,实有文体实验之意义。^⑪

周作人要求笔记“朴素通达”、“趣味渊雅”即好,“并不喜欢浓艳波俏,或顾影弄姿,有名士美人习气”。^⑫梁启超亦云,“美文,清儒所最不擅长也”,然为文多能“朴实说理,言无枝叶,而旨壹归于雅正。语录文体,所不喜也,而亦不以奇古为尚”;“其所奉为信条者,一曰不俗,二曰不古,三曰不枝”。^⑬周作人所取的清儒笔记,文风大致不出梁启超的概括;而“不俗”、“不古”、“不枝”,也正是周氏文抄的语言特色;周作人所说的“渊雅”之趣味与梁启超的“雅正”,亦颇为接近。清儒笔记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以学术考辨为目的的札记,因此,为文不枝不蔓即可。然读者如非专家,读之定昏昏欲睡,陈练青认为,此“非关题材干燥”,实是因为清儒“不善于谈话的艺术,因之文字上之组织便不能动人”。因此,望“读书人平日研究有得,欲发挥某种学理上的文章,如先把该问题与良朋作口头上讨论一二过”,然后“以谈话式的笔调出之,则必能独饶风趣,必能引起读者之注意”。^⑭周氏文抄之闲笔颇多,能以“娓语”笔调化清儒笔记之板重。另一方面,在“失之枯燥”的考据之作外^⑮,清儒笔记亦有“对于人生与自然能巨细都谈,……却又当作家常话的说给大家听”的条目,^⑯这既是周作人选择笔记的独特标准,亦是其写作“文抄”之追求。

近年来,学界对周氏文抄的评价日高,舒芜甚至称其为“前无古人后亦未必有来者的文体”^⑰;黄开发则把周作人的文章分为“情志体”、“文抄体”和“笔记体”三类,并认为“文抄体”成就最高。本文无意在“文抄”与周作人其他类型的散文中分出高下,文体本不同,其间实无可比性。但黄开发进一步指出,“抄书方式的源头是中国传统的笔记”,并注意到古人广征博引的笔记,“如为周作人在《俞理初的诙谐》一文中全文引录并大加称赞的,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四中的《女》”一文,与“文抄”有密切的联系。^⑱惜其点到即止,并无详细而全面的论述。本文的研究对象,即为周作人作于三十年代的“文

^⑩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25、50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梁启超则指出:“著专书或专篇,其范围比较广泛,则不免于所心得外摭拾冗词以相凑附,此非诸师所乐,故宁以札记体存之而已。”(《清代学术概论》第45页,中华书局,1954年)可见札记、“著述”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不能一概而论。

^⑪钱理群称周作人是“实验在‘性质较为多样’的‘随笔’中创造出一种‘新体’,即‘笔记体的散文’。”(《周作人论》第211页。

^⑫《谈笔记》,《乘烛谈》第133页,岳麓书社,1989年。

^⑬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45页~46页,梁启超所谓之“美文”,指诗词骈文,与周作人所谓之“美文”不同,然共同之处则在“文学”。

^⑭陈练青:《论读书与谈话》,《人间世》第13期,1934年10月5日。

^⑮周作人在《刘青园〈常谈〉》一文中称,自己读笔记既要“计较他们的质,又要估量他们的文。所以结果是谈考据的失之枯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62期,1935年7月28日,收入《苦竹杂记》。

^⑯《谈笔记》,《乘烛谈》第134页。

^⑰舒芜:《周作人

的是非功过(增订本)》第332页。

①9黄开发:《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第1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抄”,并试图回答周作人为什么会走向清儒笔记,以及他从清儒的文章与思想中汲取了何种资源,如何应用此资源等等问题。不过,我们亦不必把目光局限于三十年代,而须作纵向的考察。因为“文抄”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和言说方式,并非一蹴而就;周作人日后作自我总结之时,对其“文抄”亦有回顾与阐发。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提出“美文”概念,1932年又发表题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系列演讲,提倡“言志”小品,但很快又开始阅读清人笔记、写作“文抄”,其间既有个人趣味上的转变,亦有外部的原因。在笔者看来,周氏之翻阅清儒笔记、写作“文抄”,实是于无话可说、无法言说的境况之下采取的一种言说方式。与其提倡晚明小品一样,周氏阅读笔记、谈论“原始儒家”的背后,亦有着反“党八股”、“洋策论”和“新道学”的考虑,同时却又意味着对当日之文坛因学晚明小品而生浮滑之弊的反拨。因此,研究周氏文抄,不但要追寻它与所抄之文的历史联系,还必须把它放入三十年代的政治、文化现实及散文发展脉络中去考察。

一、从晚明小品到清儒笔记

周作人一直着意搜求明清乡贤著作，得“闻先贤有六经皆史之语”，自属必然。浙东本有史学传统，周作人亦自认“风土之力”对其文章和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不过，周作人所谓之“乡贤”，还包括其“大同乡”浙西之文士。他在作于1923年的《地方与文艺》一文中称：

近来三百年的文艺界里可以看出有两种潮流，虽然别处也有，总是以浙江为最明显，我们姑且称作飘逸与深刻。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②

换言之，“浙西学派偏于文，浙东则偏于史”，^③读史论史强调的是“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偏于文”则“不一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即可。后者以晚明的王季重和张宗子为代表，下逮袁枚、赵益甫；浙东之“师爷气”则以清儒章实斋、李越缦和其师章太炎为代表，“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④而鲁迅则可谓集大成者。周氏兄弟对野史笔记有着共同的兴趣，二人常借南宋和明季之故事来讽喻现实，且观点常惊人的相似。周作人似亦可归入“师爷派”，不过，他此时却颇慕其“大同乡”浙西文士之“飘逸”，欲以之祛除自己的“师爷气”；同时亦在思索此派文章的可资借鉴之处：王季重、张宗子的短文，“承了语录的流，由学术转到文艺里去，要是不被间断，可以造成近体散文的开始了”，可惜“不幸被清代的古学潮流压倒了”^⑤。

在关注浙西之文的同时，周作人亦颇悔其旧作：“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觉得自己的早期杂文“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多是照例骂那些道学家的，但是事既无聊，人亦无聊，文章也就无聊了”，因此在编订文集之时，多弃之不取。至于“以后要怎样才好，还须得思索过”。^⑥

思索的结果终发而为系列演讲并成书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②《地方与文艺》，《谈龙集》第10页，岳麓书社，1989年。

③周作人：《鲁迅的文学修养》，《年少沧桑——兄弟忆鲁迅（一）》第19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周作人在该文中还称，浙东“风土之力”对鲁迅的性格和文风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鲁迅不但读过《文史通义》和《越缦堂日记》，“就是只听祖父介孚公平日的训话，也是影响不小了。介孚公晚年写有一册《恒训》，鲁迅曾手抄一本，保存至今，其中所说的话什九不足为训，可以不提，但是说话的黠刻，那总是独一的了”，对介孚公和鲁迅的师爷气皆有微讽。然查《鲁迅全集》，鲁迅提及章实斋、李越缦只有一处，且是以章实斋和袁枚、李越缦和赵益甫之争，来说明文坛上的争斗实“古已有之”（《“中国文坛的悲观”》，《鲁迅全集》卷5，第2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浙东之史”或对鲁迅的文章和性格之形成，有莫大的影响，但无疑是周作人对章实斋、李越缦二人更感兴趣，所以在文章中屡屡提及。1949年以后，周作人在写关于鲁迅的文章时，有意无意地掺入了许多自己的兴趣，上述即为一例。

②《〈雨天的书〉自序二》，《雨天的书》第3页。

③《地方与文艺》，《谈龙集》第10页。

④《〈雨天的书〉自序二》，《雨天的书》第3-4页。

⑤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344、3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陈平原的思路就此转入周氏散文与六朝文章的关系。陈平原对中国古代文章的关注，近来已转入“著述文体”和“学者之文”。本文思路受其启发良多，因而关注周氏文抄与清儒笔记之关系。部分清儒笔记，如为周作人所推崇的郝懿行《晒书堂笔录》，仍与《颜氏家训》有相通之处。郝氏喜读《颜氏家训》（请参阅其《亡书失现》一文，《晒书堂文集》卷五，道光十年东路所署刊本），著有《〈颜氏家训〉辨记》一书；因“为稻粱谋”，又辑有《宋琐语》一书（事见《答陈恭甫侍御书》，《晒书堂文集》卷二）。可见其颇慕六朝人的思想、风度与文章。周作人亦称：“郝君夫妇的文章思想不知怎地叫人连想颜黄门。”（《郝氏说〈诗〉》，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第22期，1935年11月21日，收入《苦竹杂记》）不过，郝懿行之所以能成为周作人心中“理想中的学者”，则又不止于其文章似颜之推，还因其治草木虫

此书提倡言志反对载道，并为中国新文学寻找到了源泉，这个源头即为晚明小品。因公安三袁有系统的文学主张，影响又较大，所以周作人改以公安竟陵为晚明小品之代表。然袁中郎等人的文章就“平淡”而言，实不如苏黄，却常以看美人之眼看山水，有名士习气却无“敦厚温和之气”。诚如陈平原所言，晚明小品与“周氏的文章趣味”，“实有不小的距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之发表，“是希望兼及现实写作”。⑥不过，周作人的目的又不仅仅在于提倡一种文体，更是以此反对“新道学”与“新古文”，这在《地方与文艺》中已说得很明白：

现在的思想文艺界上也正有一种普遍的约束，一定的新的人生观与文体，要是因袭下去，便将成为新道学与新古文的流派，于是思想和文艺的停滞就将起头了。⑦

于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不久，就警惕“新道学”和“新古文”之抬头，周作人之敏感实非常人所能及；兼及“思想”和“文艺”，亦是其一贯的思路。到了三十年代，周作人大概认为其担忧终于成了现实，因此才发布更具系统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演讲，并整理出版。

周作人于此书中，持“纯文学”之标准，全盘否定了清代的“学者之文”。他把“纯文学”与“原始文学”、“通俗文学”相对，声称自己考察的是前者。⑧清代的宋学既“无可取”，汉学亦“和文学没多大关系”，相反，汉学的“复古”思潮，却压倒了张扬个性的晚明小品。惟于汉学之“殿军”俞曲园，周作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原因很简单：“他不但弄词章，而且弄小说，而且在《春在堂全集》中的文字，有的像李笠翁，有的像金圣叹，有的像郑板桥和袁子才。于是，被章实斋骂倒的公安派，又得以复活在汉学家的手里。”⑨

提倡晚明小品，对中国现代散文之发展有着莫大的影响，然周作人以此“自救”之企图，多半是落空了。他几乎在每一册自编文集之序跋中，都要感叹自己既写不来真正平淡之文，亦无心境谈风月。他不得不承认，“我的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像他“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⑩周作人既不能忘情于时代，又对浙东之“师爷气”常存警惕之心，仍在寻找新的文章体式 and 言说方式。

周作人称,公安竟陵诸公所擅长的只是“叙景或兼抒情的小文”,至于说理之文,理虽“多正确,文未必佳”;^⑨三十年代的周氏散文,“叙景或兼抒情的小文”实际上并不多,公安竟陵自然不敷其用。而清儒既非“严肃的道学派”,亦非“风流的才子派”,为文多能“朴实说理”,因此,周作人最终转向了清儒笔记以寻求“写文章的方法”。^⑩

在探讨周作人于清儒处所得的“写文章的方法”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看一下其所谓的笔记之范畴。在他看来,笔记应包括子部“杂家”和“小说家”之一部分:

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七子部杂家类下分类解说云:

“以立说者谓之杂学,辨证者谓之杂考,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旁究物理牖陈纤琐者谓之杂品,类辑旧文涂兼众轨者谓之杂纂,合刻诸书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编,凡六类。”又卷一四〇子部小说类下云:

“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照着上边的分法,杂家里我所取的只是杂说一类,杂考与杂品偶或有百一可取,小说家里单取杂事,异闻虽然小时候最喜欢,现在则用不着,姑且束之高阁。这实在是我看笔记最非正宗的一点。……我这里所要的不是故事,只是散文小篇,是的,或者就无妨称为小品文,假如这样可以辨别得清楚,虽然我原是不赞同这名称的。^⑪

三十年代,“小品文”一词的用法之一,是涵盖一切“散文小篇”,所以周作人仍把笔记当作“小品文”之一种。但是,这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把小品文与晚明联系起来,以晚明文章来说明小品文之特色(这亦是我们今天的习惯用法),已有本质之不同。

周作人检阅自己所录的笔记条目,发现它们多出自“惘惘无华的学者”之手。1937年秋冬间,周作人又翻阅清人笔记消遣,共看了六十二部、六百六十二卷,旁置一簿,记录中意的篇名,总计有六百五十八则,“比较选得多的为刘廷献《广阳杂记》五卷,俞正燮《癸巳存稿》十五卷,郝懿行《晒书堂笔录》六卷,王侃《衡言》《放言》《江洲笔谈》共八

鱼之学,能据“目验”。郝氏之性情虽近于颜之推,然《晒书堂笔录》与《颜氏家训》在体式上却有本质之不同。《晒书堂笔录》所抄,多为前人的笔记,郝氏又加以自己的按语,周氏文抄之体式,显然与《晒书堂笔录》更为接近。

⑨《地方与文艺》,《谈龙集》第11页。

⑩《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⑪《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31、52页。

⑫《雨天的书·自序二》,《雨天的书》第3页~4页。

⑬《《梅花草堂笔谈》等》,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第46期,1936年4月30日,收入《风雨谈》。

⑭周作人于《俞理初的谈谐》一文中称,“中国文人士大抵各有他们的道统,或严肃的道学派或风流的才子派,虽自有其系统,而缺少温柔敦厚或淡泊宁静之趣,这在笔记文学中却是必要的,因此无论别的成绩如何,在这方面就难免很差了。这一点小事情却含有大意义,盖这里不但指示出看笔记的途径,同时也教了我写文章的方法也。”(《秉烛后谈》第31页~3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⑮《谈笔记》,《秉烛谈》第130页。

③《〈一簣轩笔记〉序》，《周作人文类编》卷2，第312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谈笔记》一文与此略有异同：“较好的只有傅青主的杂记，刘继庄的《广阳杂记》，刘青园的《常谈》，郝兰皋的《晒书堂笔录》，马平泉的《朴丽子》，李登斋的《常谈丛录》，王白岩的《江湖笔谈》等，此外赵云松、俞理初的著作里也有可看的東西，而《四库总目》著录的顾亭林、王山史、宋牧仲、王貽上、陆扶熙、刘玉衡诸人却又在其次了。”（《秉烛谈》第134页）然就征引率来说，《〈一簣轩笔记〉序》提及的笔记要更高些。

④胡适称戴东原学术受颜习斋影响颇深（《戴东原的哲学》，《胡适文集》卷7，第250页~25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钱穆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则力辩其无，而称之为巧合（第392页~393页、第505页）。无论如何，戴、颜学术有共通之处，倒是一定的。清初冯班亦曰：“儒书尚实行，不离日用。欧阳子云，圣人教人，性非所急，不知日用间喜怒哀乐哪一件事不是性。”（《钝吟杂录》）卷二，页八，《常熟二冯先生集》之《钝吟先生集》，1926年张鸿据陆貽典原刻本校）与习斋之学亦有共通之处；刘

卷，李元夏《常谈丛录》九卷，玉书《常谈》四卷，马时芳《朴丽子》正续四卷，其次则顾炎武《日知录》，尤侗《艮斋杂说》，梁清远《雕丘杂录》。”⑤搜之于周氏文抄的具体篇目，我们还可以加上傅青主的杂记，冯班的《钝吟杂录》，以及与俞理初有交往的蒋子潇的《游艺录》。另外，颜习斋虽无笔记文，周作人仍时时提及。

为周作人所称道的清儒，如清初之颜习斋、刘继庄和冯班⑥，乾嘉之际的戴东原、章实斋，以及嘉道之际的俞理初、蒋子潇⑦和马时芳⑧，有一个共同的特色：皆认为道不离日用而又切近人情。周作人承此脉，亦以“人情物理”为标准来辨别古今思想与文章之好坏。

从学术史着眼，学者每以重考证与否为汉学宋学之分野，或起而辩之曰宋儒如朱熹亦重考证，周作人对此一问题却不甚感兴趣。⑨他虽亦不佩服朱熹之格物功夫，⑩不过更称人情物理方是第一要义：苟不懂人情物理，“结果是学问之害甚于剑戟，戴东原所谓以理杀人，真是昏天黑地无处申诉矣”。⑪周作人首先看重的，正是清儒汉学的义理，他认为，有此义理做底子，发而为文，方能有通达的态度和清明的理性：

学问渊博固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见识通达尤为难得，有了学问而又了解物理人情，这才能有独自的见解，……此又与上文所云义理相关，根本还是思想问题。

不过，周作人抄录介绍的，却非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一类“关于义理的话”，乃是“知人论世、实事求是的部分”。⑫换言之，周作人关注的是那些把戴震等人的“新义理”⑬用诸论事论人的较为具体的文字。另外，笔记多以简短之条目成卷，更便于周作人加以“六经注我”式地择取，而他种文章则无此便利。

诸儒之中，周作人对俞理初的评价最高，称其与王充、李贽并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三盏明灯”，其共同之处则在于“疾虚妄”。

俞理初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并不高，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无传，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亦未提及，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只有片言只语及之，评价亦不高。然俞理初亦颇为一部分人偏爱，如蔡元培、叶恭绰及周氏兄弟。⑭